

边缘中国

天上攸乐

——普洱茶的八座山和一座城

雷平阳 著

青岛出版社

作者简介

雷平阳

雷平阳，男，1966年秋生于云南昭通市土城乡欧家营，1985年毕业于昭通师专中文系，现居昆明。中国作协会员、云南省作协签约作家。出版专著有《风中的群山》、《云南黄昏的秩序》、《雷平阳诗选》、《我的云南血统》等。曾荣获《诗刊》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人民文学》诗歌奖、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诗人奖、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2006年度青年作家、1986~2006年中国十大新锐诗人、明天·额尔古纳华语诗歌双年展新锐诗人、云南省“四个一批”人才奖和云南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等奖项与荣誉。

现供职于昆明市文联《滇池》文学杂志社。

装帧设计
黄任书
从书编辑
赵文生
黄发有

边缘的魅力

中国地大物博，地势西高东低，自西而东构成了三级阶梯，从雪域高原过渡到山地、盆地，再过渡到丘陵和平原。气候同样是复杂多样，从南到北跨越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等气候带。与这种地理形态的自然级差相对应，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也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筛选和积淀，创造了多元而丰富的文化。就文化类型来说，尽管狩猎与采集类型和斯威顿耕作类型正在逐渐告别自己的舞台，但鄂伦春、鄂温克等狩猎民族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依然在顽强地赓续这两种文化传统的香火，它们和畜牧类型、农业类型、工业类型等交相辉映，五种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类型在广袤国土上呈现出奇妙的并置状态。从中国的东部走向西部，犹如置身于一条奇妙的时间走廊，在岁月的河流上逆流而动，让你感受到从后现代、现代上溯到前现代社会的文化时差。生存环境的多样化催生了文化的多样性，恰如美国历史学家B.M.费根所言：“文化是我们适应所处的环境的重要手段。”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

西南和东北等地区。中华文化融汇多民族文化于一体，并长期保持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多元复合的文化结构与内在的差异性带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一书中说：“真正的创造性并不导致一致性。……不同文化的人所信奉的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观念只要互不对抗，就能使当代世界增添丰富性和活力。”不强求一致，不妄自尊大，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兼收并蓄各种优质文化因子，这为文化的反复选择与再生提供了多种途径。即使在汉族文化内部，不同民系、不同聚居区和不同阶段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这样的文化视野中，中国本土文化的自我更新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中华文化内部的主流因素与异质成分的撞击与交融，有利于打破沉闷、僵化的格局，获得崭新的活力与生机。中华文化的未来选择也不必长期地陷入要么西化要么国粹的怪圈，多民族文化的相知与互补既是重要的价值参照系，又是不可或缺的文化追求与建构目标。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市场化、工业化和殖民化进程都在推广西方文明的现代化经验。当英语的版图不断扩张时，越来越多少数族群的语言正在消亡，据说新世纪每年平均有二十种语言失传，这意味着通过这些语言记忆并传播的文化也同时湮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可口可乐、麦当劳一样，如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世界上最为偏远的角落，与此同行的还有环境污染、疾病和犯罪。即使在白雪皑皑的珠穆朗玛峰，在海拔六千五百米以上的区域也不难见到帐篷、煤气罐、塑料袋、氧气瓶、电池等废弃物。在中国一些城市，隆隆的铲车以城市改造的名义，冠冕堂皇地推倒那些保

存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建筑，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西式水泥丛林。走进那些偏僻乡村的古老民居，你能够轻易地发现走出老屋是那些居留者的梦想，搬进洋房是他们的人生指向。当人们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一体化的旋涡时，幸福的含义也就不能不变得苍白而贫乏，每个人的标准都大同小异，环球同此凉热。从文化的兴衰更替来看，那些处于环境封闭、社会发育迟缓状态中的民族与地区，要毫无保留地拥抱“现代化”，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民族同一性和文化价值观，而坚守自己的文化特性往往意味着与外来文化绝缘，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拉锯式的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两难困境。

让人纳闷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理所当然地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当成水火不容的东西，甚至心安理得地认为割裂传统是“现代化”的必要代价？就像各地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总是追求焕然一新，似乎非要把所有旧时代的印迹连根拔除不可。中国人谈论各地的城市，最不屑一顾的评价莫过于“太土了”或者“整个一个大农村”，“土”和“农村”就意味着糟糕。在各大城市，“乡巴佬”也还是对人最蔑视的称呼，吐出这样的字眼的人，口气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恶毒的快意。任何一个在厚实的乡村传统中建立起来的中国城市，大概都难以摆脱这种过渡性的“郊区化”特征。乡村记忆一如孙猴子的尾巴，他就是会七十二变，也顶多只能将尾巴变成旗杆。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无不打上了以农耕为本的家族文化的烙印。事实上，中国如果能够有一座城市将现代文明的好处和田园风光的美妙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才是真正完美



的、人性化的城市典范，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莫大贡献。其实，在西欧发达国家，传统和现代水乳交融，最古老的传统依然鲜活，像一棵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样，依然开花结果，参与光合作用。遗憾的是，我们的传统却在逐渐枯萎，像冯骥才等有识之士苦心孤诣地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实践，旨在保留文化的火种，但是，我们从现实的虎口中抢出来的，常常是一些无法呼吸的传统，真是让人痛心！

那些民间的、边缘的文化本来就是一种隐性的、被压抑的、被遮蔽的文化，难道彻底湮灭是它们难以摆脱的宿命？事实上，这些脆弱的、原生态的文化就像深藏的地下水一样，滋养着一方土地上的一方人群，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犹如遗传基因一样，塑造了濡染其中的民众的独特气质。那些中心的、主流的文化经过理性化的修饰和改造，就像奔涌在运河与水库中的流水一样，是一种具有表演色彩的文化象征。而且，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唇齿相依，一旦地下水系枯竭，地表水系就水落石出。为了避免使自己成为平均化的全球公民，以外来文化作为镜子，开掘沉睡于脚下的土地之中的民族文化记忆，抗拒遗忘，才能将厚重的传统资源转化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打破封闭的心理定势，激活曾经长期被抑制的边缘文化的创新能力，优势互补，形成互动共生的良性循环格局。在生态学的视野当中，文化的等级关系应该被深刻质疑，我们不能用单一标准来判断复杂而多样的文化的价值，我们必须把共同历史时空中的所有文化存在当成有机的生命系统，平等地看待它们的存在价值，而不是惟我独尊地以一种价值形态排斥其他的价值形态，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每一种文化形态在功能系统中的独特位置，才能维持文化的结构平衡。就自然生态而言，生物的多样性增强了环境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环境恶化的重要表征，比利时科学家P.迪维诺在《生态学概论》中说：“在退化的情况下，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转变成单调的生态系统时，伴随出现的将是由稳定变成不稳定。”与此相应，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某种性质、功能单一的文化形态一元独大时，文化环境也呈现出恶化的趋向，文化应该在连续性的、自由竞争的、多元共存的、正常新陈代谢的、平稳过渡的环境中走向繁荣。在文化的精神生态中，各种力量必须在相互制约中相互依存，如果某种力量成为绝对强势的权力，霸权意志都必然使文化自身的规律遭到破坏，文化形态将变得单一、僵化，被纳入森严的等级体系。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认为要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必须开展积极的文明对话：“我们希望通过文明对话来鼓励各种积极的全球化力量，从而增进物质的、道德的、审美的和精神的愉悦，并特别关注那些在当前经济发展潮流中陷入困境的、受到损害的、沦为边缘的和孤立沉默的人群。我们还希望通过文明对话促成对个人知识、群体凝聚力、自我理解以及个体和群体认同意识的有益探索。”

我们推出《边缘中国》丛书，倡导以美文笔法，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文化视野，对中国边缘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进行审美化的描述，对其文化形态进行深层的、立体的散点透视。丛书邀请生长于这些地区或长期在这些地区生活、工作的著名作家与学者撰

稿，他们以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揭示这些地区的文化底蕴，向外部世界掀起其神秘面纱的一角。这些地区地理形貌雄奇、壮丽，展示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社会民情保留着相对淳朴、本真的状态，在人性层面上也呈现出更为原始的野性与活力，同时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比较闭塞，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值得注意的是，在尊重与包容差异性的前提下，经济水平不能成为衡量一种文化的优劣的唯一标准。丛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重点介绍这些地区的自然风貌、民居、民艺、民俗，进而以精炼的文字，言简意赅地探问其背后的历史源流与文化成因。

“边缘”意味着多种可能性，意味着多元的文化融合，边缘地带与中心地区的交流互动，能够激发社会、经济、文化的多重活力。边缘与中心的异质异趣的相互沟通，相互补充，相互激发，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丰富的、具有创造活力的经济结构与文化生态。

黄发有

（《边缘中国》丛书主编）

序 言

在一次次面对难以驯化的魔力时，我们的祖先在迷惘之后，形成了共识：神奇的植物之上，都附有神灵或精灵。有的魔力，已经被人类所认识，但还继续困扰着其他生灵——比如，在西双版纳地区被人们称为“饿叶”的茶叶，人们最先视其为始祖或通向祖先之魂的载本，可随着宗教史、心灵史和文化史的艰辛演变，它逐渐地变成了祭品、药品、贡品、饮品和商品，仅存的“魔力”，是它那沟通灵与肉的功能，从而仍被人们视为世俗生活中美的极致，是一种可以食用的宗教。然而，当人类在体认茶叶所历经的几千年时光中，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依然像谜一样存在：除了人，孟加拉虎、野象、麋鹿、牛、马……任何一种飞禽走兽，都对茶树视而不见，从不食用。仅仅因为它是“饿叶”？我希望谜底就这么简单。

从2000年开始，我就一直行走在盛产普洱茶的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上。这六座古茶山，分别是基诺山、莽枝山、革登山、蛮砖山、倚邦山和易武山。来自植物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边缘政治学的诸多资料告诉我，它们是茶叶的核心发祥地，更是茶文化的“故宫”。西方的一些汉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起始于云南澜沧江领域，沿青藏高原边缘，直达中亚并连通世界的茶叶贸易之路，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条茶路。这条茶路的开

通时间，与人类的文明史同步，远远早于一些普洱茶专家测定的一千七百年前。因为此路状若一张长弓，被命名为“茶文化之弓”。从此弓发射向世界的茶品，历来都是紧压茶，紧压茶的祖先是竹筒茶。在此观念下，黑夜中摸索的茶叶史家们所说的紧压茶工艺来自中土的论调，显然是走上了迷途。

西方的中世纪，有一幅“半人毒参茄”画像，源于人们对“毒参茄”这种植物的理解和利用：毒参茄的根晒干之后，可以雕刻成偶像或其他图腾，佩之于身，是护身符，能护佑爱情与财运。但通常情况下，晒干后的毒参茄根，往往都被卖给了巫婆和炼金术师，以作迷药的原料。不过，被刻成护身符或被制成迷药的毒参茄，仍然是少部分，更多的，则被具体的采摘者偷偷放入食物，自己吃掉了，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毒参茄的功能。

有时候，我也觉察到了文化学领域内“毒参茄现象”的存在。这种现象本无可厚非，如果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对致幻剂孜孜以求的历史，那我们这些秦始皇和徐福的后人，还有什么可苛求的呢？清醒和理性，是需要代价的。著名的迷药曼陀罗草，你用刀锋探之，它就会发出哀叫，刀锋无损，可那些听见哀叫的人，却可能一生都被神经错乱所困。

我着迷于普洱茶，乃是倾心于它那无出其右的品质，孕育了世界茶文化史而又几千年隐身于滇土的操守，以及它与茶山民族之间神鬼莫测的生死关系。所以，我弯下了腰，尽可能地贴紧一座座茶山。根本用不着美化，一切正好相反，人们眼中的人间天堂——西双版纳，当我靠近它，我才发现，这是一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与其他土地不同的是，这儿的每一寸土，只要你让它荒着，它就会在你的一个梦境没有做完之前，长满茂盛的植物，借以湮灭种种哀痛。茶以苦味度天下，普洱茶之苦，更多的是那些一代代守护在茶树脚下的民众的生命之苦。从碑

文内容鸡零狗碎的茶案碑到人鬼分家的司杰卓密；从起始于茶客的攸乐起义到一个个灭绝于瘟疫的寨子……我之所见、所闻、所想，只是力图从个人的视角，绘制一幅流着血泪和茶汁的茶山画卷。

原计划只写古六大茶山，后来又加入了宁洱城、布朗山和南糯山。加入它们，宁洱城基于茶叶集散，布朗山基于布朗族文化，南糯山则基于傣侬人文化和其在现代普洱茶历史上的开辟性地位。如此，或许要圆满一些。至于书名取《天上攸乐》，因为基诺山古称攸乐山，“攸乐”词意不错，若取之“天上基诺”，意思就偏了。基诺，基诺语，汉译“舅舅的后代”。

雷平阳

2007年8月30日于昆明金殿后山靖闲谷

目 录



序言 / 1

南糯山记 / 1

布朗山记 / 34

基诺山记 / 65

蛮砖莽枝革登记 / 91

倚邦易武记 / 129

宁洱记 / 167

后记 / 199

主要参考书目 / 201

南糯山记



西双版纳旧称车里。明朝冯甦《滇考》中说：“车里，在八百东，即古产里。汤时以短象、象齿为献，周公赐指南车归，故名曰车里。元兀良吉歹戌交趾，经其地，降之。至元中，置撒里路。明改车里军民府，寻升宣慰司。永乐中入寇，后惧而谢罪。万历十一年，明伐緬，其酋刀糯猛使贡象，实阴付于緬。兄居大车里，应緬使，弟居小车里，应汉使焉……”关于“车里”之名的来历，道光《云南志·地理志》亦云：“周成王时，越裳氏来朝，周公作指南车导王以归，故名车里。”

南诏国时期，设有金生城和银生城。方国瑜先生考证：“樊绰《云南志》丽水城曰：‘从上郎坪北里眉罗苴、盐井，又至安西城。’又曰：‘眉罗苴西南有金生城。’……金生城，疑即今之青蒲附近，在八莫北伊洛瓦底江西岸，盖金生城以产金得名，即在江边也。”至于银生城，方先生说：“樊绰《云南志》卷七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按：银生城界者，即银生节度管辖界内，今所称云南普洱茶者，实产于倚邦、易武、勐海各地……则银生城界内产茶诸



山，在今倚邦、易武、勐海等处可知也。”方先生没有明确指认银生城在西双版纳，但尤中教授的《云南民族史》一书中，则根据《南诏德化碑》所示，指认银生城就在“墨觚之乡”，即景洪一带，节度使是德化碑上的“赵龙细利”，即召龙细利。该节度之所以名“银生”，《清一统志》卷四百八十六《普洱山川》说：“整董井，在府南二百五十里，蒙诏（按即南诏）时，夷目叭细里，佩剑游览，忽遇是井，水甚洁。细里以剑测水。数日，视其剑化为银。”文中的叭细里，尤中先生说：“叭细里也可以写作叭细利。傣族中的地方头目称叭；王子则称召。细利其人，当其充当头目时称叭细利，一旦成了大王，便称召龙细利。”

金生城以产金而得名，银生城却无产银记载，乃是“剑化为银”，一下子就让人迷幻起来了。秘境之地，不辨东西南北，所以，这儿的头目进见周成公，周成公还怕他找不到回家的路，命人为他制作了一辆指南车。其实，“周公作指南车导王以归”一说，同样是玄说，“指南”器具的发明，非周时所能为，乃后世为之，况就算有了一辆指南车，它如何能从中土驶入“墨觚

之乡”？中原入滇之“五尺道”始修于秦，且雄山大川之间，马行亦需贴壁悬空，步步生死，明万历元年，四川巡抚曾省吾携万千兵将进剿僚僰，入此路便云：“石门不容轨，聊舍车而徒。”指南车在此，与“剑化为银”同出一辙，



大量的古茶树被发现，计算年轮和测量树围几乎成了屡屡见诸于报端的地方性新闻。



南糯山的黄昏。一副混沌初开的景象。

乃是史官们面对极边之国和蒙尘的光阴束手无策而凭生的无边想象。据此，我们也就不难发现，当地图上的名字都虚幻如梦境，地理学犹如迷药的配方，穷极地端的西双版纳在人烟袅袅升空以来，它除了受制于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边缘政治（且政治之剑大都只插向短狗和耕象等异物的心脏），更多的时候，它乃是一个隐伏于热带雨林中的不为人知的自由王国。我们言必称此地的部落与王国屡屡进献于朝廷，乃是汉文化的话语霸权所致。《新唐书·南蛮传》云：“大中时（847~859年），李琢为安南经略史，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夷人不堪，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号白衣没命军。”明代陈文编修的《景泰云南图经志》：“至元甲戌，立彻里路军民总管府，岁赋其金银，随服随叛……其民皆百夷，性颇淳，额上刺一旗为号。作乐以手拍羊皮长鼓，而间以铜铙、铜鼓、拍板，其乡村饮宴则击大鼓，吹芦笙，舞牌为乐。”这两则典籍，白衣没命军，飘逸出尘却又生死不顾；额上刺旗且又性颇淳且又好饮宴且又随服随叛，

大有魏晋的华美风骨。它们于字里行间，隆重举行的，一直是一场无须域外之人观赏的亦悲亦喜的旷世盛宴。叛，非叛也，自由的元素。

二

现在，我就站在或产里或交趾或撒里或车里或银生城的古老城邦的遗土之上，身后是集五十多年心力而建起来的崭新的景洪城，面对着的，是沉默而又动荡着的澜沧江。远处的跨江大桥，不是什么飞虹，倒像是一棵足以庇护一座寨子的大榕树，它以身躯横江，交通南北。就像大理古城总是在日斜西天之际陷入苍山的阴影，景洪城也一样地可以看着秀美无极的南糯山，



傣侬人居住的水河老寨，孩子们常把露台当成舞台。